

前　　言

在唐朝历史上，提到唐太宗李世民、唐玄宗李隆基、女皇武则天，人们也许并不陌生，可是说到唐宪宗李纯、说到唐宪宗统治时期出现的“元和中兴”、说到唐宪宗在大唐帝国走向中衰时期为重新振兴国家所做的种种努力及其建立的功业，知道的人就不那么多了。实际上早在一千多年以前，许多人就已经将唐宪宗的元和年号与贞观、开元并列在一起，将宪宗与太宗、玄宗看作是唐代最杰出的三位帝王了。

唐宪宗李纯，是唐朝第十一代皇帝，生于公元778年，死于公元820年，二十八岁即皇帝位，在位十五年（806—820年），终年四十三岁。

宪宗生活的时代，是唐帝国经历了开元、天宝的鼎盛时期之后，骤然走向衰落的时期。公元755年爆发的安、史之乱，引发了唐帝国积蓄已久的各种社会矛盾，使唐帝国由峰巅跌入了底谷。社会的变化、动荡空前剧

烈。社会经济、文化的变化不必说起，在人们的 social 政治生活中，影响最大的，莫过于藩镇割据了。藩镇割据的出现，有其深刻的社会根源，有其产生的历史必然性。然而，对于唐朝廷来说，对于广大的民众来说，藩镇割据的存在，意味着唐帝国的分裂与中央集权的削弱；意味着战争的连绵不断、藩镇强取暴敛的加剧及人民生活的无限痛苦；意味着社会生产不断遭到破坏和社会发展的停滞不前。因此，结束藩镇割据，维护中央集权和国家统一，既是统治者维护统治的需要，也是广大民众的迫切要求和期望，同时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处于国家最高领导地位的封建皇帝，怎样对待藩镇割据，怎样对待国家统一，怎样对待民众的疾苦，怎样处理个人私欲与国家利益的矛盾，就成为人们对其功过是非进行客观评价的主要依据。从这许多方面来看，可以说唐宪宗无疑是唐中期以后诸帝中的佼佼者。

唐宪宗的历史功绩，首先表现为他坚持“以法度裁制藩镇”的基本方针，始终不渝地将削平藩镇割据、维护国家统一、加强中央集权作为自己毕生奋斗的目标。宪宗登基不过数日，西川的刘辟便公然向年轻的帝王提出挑战，企图谋取三川，割据西南。宪宗不畏艰难，勇敢地接受挑战，果断地镇压了西川与夏绥的叛乱，揭开了“以法度裁制藩镇”的序幕。在以后的年代里，宪宗先后平服镇海、淮西、成德、平卢、卢龙、魏博等大河南北数十个割据藩镇，重新实现了国家的统一。唐朝国势重新振兴，中央权威再度树立。这里，历史与社会所提供的有利条件固然重要，然而如果没有宪宗个人的才

智及杰出的组织领导作用，这个局面也是难以出现的。

宪宗的历史功绩，还表现为执政期间，“举贞观、开元之政”，励精图治，坚持改革，废除前朝种种弊政，释放宫女，停止进奉，裁汰冗员，整顿吏治，严惩贪赃，禁掠奴婢，使代、德以来的社会风气为之一变。

宪宗坚持“为政之本，在于安人”的原则，重视农业生产，注意水利兴修，改革赋税制度，对关系国计民生的事务亲自过问，使元和年间（806—820年）的生产有所发展，民众的负担不因讨伐割据藩镇的战争而有过多加重。事实上，元和年间的平藩战争虽然耗费了大量人力物力，但宪宗并未忘记百姓的疾苦，十多年里，他为百姓遭受各种灾害而蠲免的钱粮，无论是在次数上还是数量上，都可以说是唐中期以后诸帝中最多的。此外，宪宗重在与藩镇争夺赋税的方针，无疑也有益于民众负担的减轻。

宪宗执政的多数时间里，坚持任人唯贤的原则，善于发现人才，用人所长，使元和年间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舞台上，群星璀璨，人才济济。宪宗任用贤相良相之多，在唐中期以后的历史上，可以说是首屈一指。李绛、裴垍、李吉甫、武元衡、裴度、崔群等人，即使在有唐一代，也是难得的良相。在征讨藩镇的战争中，宪宗不拘资历，大胆起用年轻的才勇之将，高崇文、李光颜、乌重胤、李愬等大批杰出的将领脱颖而出，成为平定藩镇的骨干。

宪宗注意树立良好的政治风气，鼓励大臣直言极谏，自己则虚心纳谏，“为君推诚，为臣尽忠”，是宪宗调整君臣关系的准则，由于宪宗的大力倡导，元和年

间，敢于直谏的大臣大为增加，形成了贞观、开元以来从未有过的良好的政治空气。

宪宗执政的初期、中期，注意个人品行修养，严于律己，勤于政事。为筹集平藩的经费，长期“缩衣菲食”，过着十分俭朴的生活。十几年里，宪宗兢兢业业，无论是“大雪深数尺、天气奇寒”的严冬，还是“大暑方甚”的酷暑，宪宗坚持上朝不辍，忙于朝政，为臣民做出了好的榜样。

宪宗有着坚强的性格和果敢的意志。在平定藩镇的过程中，多次临危不惧，遇难不乱。虽然征讨藩镇的战争多次受挫，然而宪宗从不为此沮丧退缩。元和十一年（816年），铁城大败，中外惊愕，群臣纷纷要求罢兵，宪宗力排众议，坚持征讨，终于取得了平定淮西的重大胜利。

宪宗是一个头脑灵活的政治家，而不是一个不识机变的愚夫子。他能够根据客观情况的变化调整修正自己的方针，将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对于祖先遗留下来的制度，他采取“苟非是，奈何不改”的态度，大胆创新，去弊兴利。讨伐藩镇，也能够注意在不利的情况下作出必要的暂时的妥协，在处理民族关系上，同样体现出这种灵活的特色。

宪宗重视文教，倡导文学，为元和文坛的繁荣，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使元和时期的文化，在中国文化史上留下了颇重的一笔。

作为一个封建帝王，宪宗可以说得上是一个圣明之主，一个中兴之主。当然，时代的、阶级的局限性也不能不在宪宗的身上反映出来，即使上面所说宪宗的许多

优点，有时也会与相反的缺点同时并存于一身，特别是在元和十二年(818年)取得平定淮西的胜利以后，宪宗在胜利的形势下骄傲起来，在思想、政治、生活各方面都发生了明显变化，这种矛盾现象就显得更加突出。人，是社会的人，出现这样情况并不奇怪，作为一个封建帝王更是如此。我们既不因宪宗的某些缺点而否定其平定藩镇、中兴大唐的功绩，也不因其历史功绩而否定其存在的局限性。总的来说，宪宗晚年的变化更多地属于封建帝王本身的局限性，这种局限性并不能影响他作为一个奋发有为，励精图治并取得很大成功的封建帝王在历史上的突出地位。这就是我们对唐宪宗的一个基本评价。

本书的写作，遵循这样几个原则：

第一，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客观地实事求是地反映宪宗的一生，一切依现有的史料来说明问题，以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来分析问题，力求接近历史的真实。

第二，重在反映宪宗的一生，但又不完全局限于宪宗。宪宗是社会的宪宗，不是孤立的没有社会联系的超人，因而，对于与宪宗相关的历史人物及社会背景，亦给予必要的论述。以求从众多的社会联系中进一步深入了解宪宗。

第三，本书涉及唐史研究的许多方面，其中一些观点仅是著者个人的学术见解，未敢言必是。书中引用他人论著，尽可能一一注明出处，以免掠人之美。

由于笔者学识所限，疏漏错误之处在所难免，衷心欢迎学界同仁及读者批评指教。

作者

1994年12月30日

· 5 ·

目 录

前 言 (1)

第一章 动荡中成长

第一节 生不逢时 (1)

 一、大唐帝国的由盛转衰 (1)

 二、受冷落的皇曾孙 (8)

第二节 目睹藩镇的跋扈 (16)

 一、祖父的改革 (16)

 二、尚武的母亲家族 (19)

 三、历泾师之变 (21)

 四、祖父的退却 (26)

第二章 内禅嗣位

第一节 父亲的储贰危机与短期执政	(30)
一、郡国大长公主事件	(30)
二、父皇的改革	(34)
第二节 永贞内禅	(42)
一、矛盾交错	(42)
二、册封太子	(48)
三、内禅之谜	(53)

第三章 元和新政

第一节 调整人事 贬黜二王	(60)
一、倚以腹心之任	(60)
二、贬黜二王集团	(64)
第二节 孜孜以求 探索治道	(69)
一、追二祖道德风烈 树良好君臣关系	(69)
二、虚心求谏纳谏 形成批评风气	(72)
三、以史为鉴 坚持宽仁为本	(84)
第三节 整顿吏治 严惩贪赃	(89)
一、精选官吏 裁汰冗员	(89)
二、加强法制 惩治贪赃	(98)
第四节 革除时弊 淳化风气	(114)
一、禁止进奉 释放宫女	(114)
二、禁掠“南口” 安辑生民	(127)

第四章 讨平三镇

第一节 平定西川刘辟叛乱	(139)
--------------	-------

一、刘辟反叛与三川地位	(139)
二、讨平西川与善后措施	(146)
第二节 平定夏绥、镇海之乱	(158)
一、杨惠琳之乱的平定	(158)
二、平定李鏗叛乱	(161)
三、策略性的妥协方针	(172)

第五章 征讨成德与魏博归服

第一节 困难的抉择	(177)
一、李绛的方镇对策	(177)
二、被迫的决定	(185)
第二节 艰难的征讨	(192)
一、命将的争论	(192)
二、南北夹攻成德	(196)
三、拘捕卢从史	(205)
四、白居易罢兵三疏	(210)
五、教训结果影响	(215)
第三节 魏博归服	(222)
一、魏博事变与对策	(222)
二、推心招纳	(226)
三、魏博归服的影响	(230)

第六章 元和年间经济财政的整顿

第一节 “为政之本，在于安人”	(233)
一、“百姓既足，君孰不足”	(233)
二、鼓励发展农桑 重视兴修水利	(236)
三、坚持蠲免钱粮 优恤灾困百姓	(245)

四、严禁私度僧道 减少捉利钱户	(253)
第二节 整顿财政、漕运	(261)
一、财税三分法的改革	(261)
二、改革盐法 收利中央	(269)
三、整顿漕运 疏通财路	(276)

第七章 征讨淮西

第一节 战前形势	(282)
一、淮西叛逆	(282)
二、力量对比与严缓招抚	(290)
第二节 战争初期	(298)
一、初战受挫	(298)
二、韩愈《论淮西事宜状》	(301)
第三节 两京事变	(307)
一、西京谋杀宰相案	(307)
二、东京圆净谋反案	(314)
第四节 两线作战	(319)
一、易帅再战	(319)
二、二讨成德	(323)
三、铁城之败	(327)
四、再罢河北行营	(331)
第五节 平淮西的最后阶段	(335)
一、郾城大捷与李愬备兵	(335)
二、裴度督军	(342)
三、李愬雪夜下蔡州	(349)
四、善后措施与《平淮西碑》	(354)

第八章 割据藩镇的全部平服

第一节	成德的归服与平卢的顽抗	(363)
一、	不战而屈成德	(363)
二、	争取平卢归服的失败	(367)
第二节	讨平李师道	(371)
一、	大军压平卢	(371)
二、	刘悟返兵擒师道	(379)
三、	收复平卢的善后事宜	(383)
第三节	天下一统的再现	(390)
一、	所有藩镇的平服	(390)
二、	沂州之屠	(393)
三、	平定藩镇的历史条件与个人作用	(396)

第九章 以怀柔安抚为主的民族政策

第一节	“虽云两国，实若一家”	(406)
一、	精心维护唐吐关系	(406)
二、	三州交涉	(411)
三、	“有意复陇右故地”	(416)
第二节	抚绥回鹘、党项、沙陀、南诏	(420)
一、	与回鹘的绢马贸易及和亲	(420)
二、	抚绥党项、沙陀、南诏	(427)

第十章 异彩纷呈的元和文化

第一节	整顿教育 发展科举	(435)
一、“革国学以振儒风”	(435)	
二、重科举以求贤能	(439)	

第二节	热衷诗歌 提倡古文	(444)
一、	“诗到元和体变新”	(444)
二、	支持古文运动	(452)
第三节	留意典故 爱好文艺	(456)
一、	读书与修史	(456)
二、	著述与文艺	(461)

第十一章 晚年变化与崇佛佞道

第一节	“淮西既平，上浸骄侈”	(465)
一、	由提倡节俭到渐趋奢侈	(465)
二、	由任用贤良到贬贤任佞	(468)
三、	由内外平衡到独倚宦官	(476)
第二节	迎奉法门寺佛骨	(485)
一、	崇尚佛法	(485)
二、	迎奉佛指舍利	(490)
三、	谏佛骨事件	(495)
第三节	佞道与服食仙丹	(501)

第十二章 宪宗之死与身后褒贬

第一节	立储之争	(511)
一、	立后之争	(511)
二、	储位之争	(514)
第二节	宪宗之死	(518)
一、	暴崩之谜	(518)
二、	文、宣复仇	(523)
第三节	身后褒贬与研究	(526)
一、	历代评价	(526)

- 二、结束语 (533)
- 附录：唐宪宗生平大事年表 (537)
- 后记 (557)

前　　言

在唐朝历史上，提到唐太宗李世民、唐玄宗李隆基、女皇武则天，人们也许并不陌生，可是说到唐宪宗李纯、说到唐宪宗统治时期出现的“元和中兴”、说到唐宪宗在大唐帝国走向中衰时期为重新振兴国家所做的种种努力及其建立的功业，知道的人就不那么多了。实际上早在一千多年以前，许多人就已经将唐宪宗的元和年号与贞观、开元并列在一起，将宪宗与太宗、玄宗看作是唐代最杰出的三位帝王了。

唐宪宗李纯，是唐朝第十一代皇帝，生于公元778年，死于公元820年，二十八岁即皇帝位，在位十五年（806—820年），终年四十三岁。

宪宗生活的时代，是唐帝国经历了开元、天宝的鼎盛时期之后，骤然走向衰落的时期。公元755年爆发的安、史之乱，引发了唐帝国积蓄已久的各种社会矛盾，使唐帝国由峰巅跌入了底谷。社会的变化、动荡空前剧

烈。社会经济、文化的变化不必说起，在人们的 social 政治生活中，影响最大的，莫过于藩镇割据了。藩镇割据的出现，有其深刻的社会根源，有其产生的历史必然性。然而，对于唐朝廷来说，对于广大的民众来说，藩镇割据的存在，意味着唐帝国的分裂与中央集权的削弱；意味着战争的连绵不断、藩镇强取暴敛的加剧及人民生活的无限痛苦；意味着社会生产不断遭到破坏和社会发展的停滞不前。因此，结束藩镇割据，维护中央集权和国家统一，既是统治者维护统治的需要，也是广大民众的迫切要求和期望，同时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处于国家最高领导地位的封建皇帝，怎样对待藩镇割据，怎样对待国家统一，怎样对待民众的疾苦，怎样处理个人私欲与国家利益的矛盾，就成为人们对其功过是非进行客观评价的主要依据。从这许多方面来看，可以说唐宪宗无疑是唐中期以后诸帝中的佼佼者。

唐宪宗的历史功绩，首先表现为他坚持“以法度裁制藩镇”的基本方针，始终不渝地将削平藩镇割据、维护国家统一、加强中央集权作为自己毕生奋斗的目标。宪宗登基不过数日，西川的刘辟便公然向年轻的帝王提出挑战，企图谋取三川，割据西南。宪宗不畏艰难，勇敢地接受挑战，果断地镇压了西川与夏绥的叛乱，揭开了“以法度裁制藩镇”的序幕。在以后的年代里，宪宗先后平服镇海、淮西、成德、平卢、卢龙、魏博等大河南北数十个割据藩镇，重新实现了国家的统一。唐朝国势重新振兴，中央权威再度树立。这里，历史与社会所提供的有利条件固然重要，然而如果没有宪宗个人的才

智及杰出的组织领导作用，这个局面也是难以出现的。

宪宗的历史功绩，还表现为执政期间，“举贞观、开元之政”，励精图治，坚持改革，废除前朝种种弊政，释放宫女，停止进奉，裁汰冗员，整顿吏治，严惩贪赃，禁掠奴婢，使代、德以来的社会风气为之一变。

宪宗坚持“为政之本，在于安人”的原则，重视农业生产，注意水利兴修，改革赋税制度，对关系国计民生的事务亲自过问，使元和年间（806—820年）的生产有所发展，民众的负担不因讨伐割据藩镇的战争而有过多加重。事实上，元和年间的平藩战争虽然耗费了大量人力物力，但宪宗并未忘记百姓的疾苦，十多年里，他为百姓遭受各种灾害而蠲免的钱粮，无论是在次数上还是数量上，都可以说是唐中期以后诸帝中最多的。此外，宪宗重在与藩镇争夺赋税的方针，无疑也有益于民众负担的减轻。

宪宗执政的多数时间里，坚持任人唯贤的原则，善于发现人才，用人所长，使元和年间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舞台上，群星璀璨，人才济济。宪宗任用贤相良相之多，在唐中期以后的历史上，可以说是首屈一指。李绛、裴垍、李吉甫、武元衡、裴度、崔群等人，即使在有唐一代，也是难得的良相。在征讨藩镇的战争中，宪宗不拘资历，大胆起用年轻的才勇之将，高崇文、李光颜、乌重胤、李愬等大批杰出的将领脱颖而出，成为平定藩镇的骨干。

宪宗注意树立良好的政治风气，鼓励大臣直言极谏，自己则虚心纳谏，“为君推诚，为臣尽忠”，是宪宗调整君臣关系的准则，由于宪宗的大力倡导，元和年

间，敢于直谏的大臣大为增加，形成了贞观、开元以来从未有过的良好的政治空气。

宪宗执政的初期、中期，注意个人品行修养，严于律己，勤于政事。为筹集平藩的经费，长期“缩衣菲食”，过着十分俭朴的生活。十几年里，宪宗兢兢业业，无论是“大雪深数尺、天气奇寒”的严冬，还是“大暑方甚”的酷暑，宪宗坚持上朝不辍，忙于朝政，为臣民做出了好的榜样。

宪宗有着坚强的性格和果敢的意志。在平定藩镇的过程中，多次临危不惧，遇难不乱。虽然征讨藩镇的战争多次受挫，然而宪宗从不为此沮丧退缩。元和十一年（816年），铁城大败，中外惊愕，群臣纷纷要求罢兵，宪宗力排众议，坚持征讨，终于取得了平定淮西的重大胜利。

宪宗是一个头脑灵活的政治家，而不是一个不识机变的愚夫子。他能够根据客观情况的变化调整修正自己的方针，将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对于祖先遗留下来的制度，他采取“苟非是，奈何不改”的态度，大胆创新，去弊兴利。讨伐藩镇，也能够注意在不利的情况下作出必要的暂时的妥协，在处理民族关系上，同样体现出这种灵活的特色。

宪宗重视文教，倡导文学，为元和文坛的繁荣，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使元和时期的文化，在中国文化史上留下了颇重的一笔。

作为一个封建帝王，宪宗可以说得上是一个圣明之主，一个中兴之主。当然，时代的、阶级的局限性也不能不在宪宗的身上反映出来，即使上面所说宪宗的许多